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福建的实践探索及理论演进

俞建雄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半期间，习近平始终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立足当时福建实际情况，辩证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主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地方实践，提出许多富有前瞻性的观点和创新举措，构成其经济思想框架雏形。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实践；理论演进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00(2021)02-0001-0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也是他长期主政地方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研究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的丰富经济实践和理论探索，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期实践和理论演进脉络，也有利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全方位深入学习。

一、在福建工作期间的初期实践

学习研究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经济实践探索，应当放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背景中去追寻。

(一) 厦门实践(1985-1988年)

1. “自由港”的早期实践。1985年6月，习近平来厦门工作。厦门是习近平到福建工作的第一站，当时自由港在全国是新鲜事物，没有先例可循。习近平来厦门后率先研究探索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

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厦门开放战略没有完全照搬国际通行的自由港模式，而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分三步采取渐进式思路推进，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第一步，在厦门岛内象屿建立保税仓库区进行试验；第二步，把保税仓库区升级为自由贸易区；第三步，在自贸区基础上探索在局部区域实现自由港的某些功能。

习近平设计的厦门开放路径是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自由港的渐进式变迁路径，这既符合世界自由港建设发展规律，又体现中国渐进式改革和梯度开放特点，有效推动厦门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跨越发展。这是对中国特色自由港发展之路的最初探索与实践之一，通过保税区建设，探索从货物开放贸易到服务开放贸易的渐进式路径，以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推动我国贸易发展模式转型升级。

收稿日期：2020-10-15

基金项目：全国地方党校（行政学院）2019年度重点调研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福建的实践探索与理论雏形”（2019dfdxkt056）。

作者简介：俞建雄（1977-），男，福建莆田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区域经济。

2. 税利分流,“放水养鱼”激活国有企业。“税利分流”是习近平当时众多经济改革措施之一。厦门港务局是当年负责运营厦门港的国营企业,全厦门仅有的两台桥吊都在这家企业,但使用率很低,一台桥吊年工作量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而且维护成本又高。通过数次现场调研、广泛咨询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后,习近平发现问题所在:这家企业长期处在微利或微亏状态,没有能力再投资,配套设施不齐全、基础运力不够,缺乏标准化流程环节。这也是当时厦门大多数国营企业面临的问题。当时国家对国营企业统一实行利改税,对国营企业按所有权征收的利润改为征税,税收与利润混在一起,既不能体现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也不利于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无法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针对这一情况,习近平率先对厦门港务局开展税利分流试点改革行动,只收取企业所得税,其余部分留在企业扩大再生产,放宽企业经营自主权,极大调动企业和职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在习近平的直接领导下,厦门在全国率先出台税利分流具体措施,全市66家财政预算内国营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大大增强了企业积极性。

3. 科学整治,保护生态环境。在经济转型过渡时期,人们最为关注的主题是如何快速发展经济,忽略了如何兼顾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当时厦门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区等随处可见挖沙取土、取石,原本郁郁葱葱的山顶成了“秃头”;大量城市污水直接流入筲箕湖,湖水变得黑乎乎、臭烘烘,鱼虾白鹭绝迹。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生态保护形势堪忧。“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建设?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厦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这是时任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1月10日)。紧接着,习近平到现场查看情况,迅速作出部署:首先,封锁岛内沙场和非法采石场,派宣传队伍上山下海细致宣传,加强公安、城管、城建监察大队等队伍建设;其次,组建专家组进行厦门资源开采论证,研究科学开采方法与开采计划,制定方案建议提交人大审议;最后,针对

筲箕湖污染问题创新性提出“清洁、美化、治理”方针政策,多渠道筹措排污费和技改资金,以空前力度加大环保投入,保护生态环境。

(二) 宁德实践(1988-1990年)

1. 摆脱贫困,交通先行。1988年6月,习近平调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宁德交通闭塞,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总量在全省九地市垫底。全地区有6个贫困县,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被外界称为“沿海地区黄金地段的断裂层”。宁德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落后,全市只有一条104国道。习近平来到宁德后,深入调查研究,先从解决交通瓶颈入手,提出搞汽车专用线,将点状的县串成一线,打通南接福州、北抵苍南、直达温州的闽东商贸物流大动脉。

2.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习近平在闽东的一个战略思维是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大力扶持当地特色农业发展。如发展贝类、鱼、藻类等规模养殖,培育壮大晚熟荔枝本地品种,提升古田、寿宁食用菌和茶叶品质等。工业上打破“无电办啥工业”“无工业办啥电”的禁锢,支持福安县利用当地传统茶叶贸易渠道发展商贸物流产业,利用乡贤资源鼓励寿宁人到广东办超市等。这些精准高效的措施对立足资源禀赋切实打好脱贫攻坚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3. 开拓林业产业富民新途径。习近平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闽东这样一个贫困地区,山林资源是一个重要的优势。”“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等。从特殊的意义上理解,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1]正是在他非凡的智慧和创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宁德开始绘制一幅兴林富民蓝图,从1988年起推行荒山绿化植树造林。同时习近平高度重视林业制度建设,建立完善林业责任制,健全林业经营机制,致力谱写振兴宁德林业新篇章。如今,宁德群山翠绿、瓜果飘香,竹产业、花卉苗木、生态旅游等有力支撑广大群众增收致富。

(三) 福州实践 (1990-1996年)

1. 科学谋划“3820”工程,为福州擘画发展蓝图。1990年4月,习近平从宁德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经过前期充分调研论证,1992年他亲自主持福州“3820”工程规划研究,制定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方案,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等,构建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战略布局。在习近平主政的近6年时间里,福州的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不足100亿元增长到1996年的近600亿元,社会民生方面得到长足发展,为全面发展的实践认知树立了地方发展样本。

2. 力推国有企业股改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习近平主政期间,福州的经济改革措施和力度前所未有,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在习近平的直接领导下,一批国有企业成功完成股份制改造。比如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现为“三木集团”)历史包袱较轻,业务相对纯粹,企业经营班子有活力,被选为最早的股改对象,经股改上市后,公司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增长,既解决了资金问题,又解决了国有企业“一股独大”、治理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经过改制探索后,其他国有企业陆续进行股份制改革。福州福发发电设备公司(现简称“闽福发”)、福州天宇电气公司(现简称“天宇电气”)等国有企业股改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关劳动就业、薪酬制度、干部人事选聘等规章制度逐步规范,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效益逐渐好转,最终陆续成功上市。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当时福州市属国有企业上市数量最多,涉及行业也最广。

3. 筹建首个由地方政府全资投资的现代化国际机场枢纽。作为省会城市,福州在90年代早期没有民用机场,只有一个小军民两用机场,年吞吐量只有140万人次,既无国际航班,也无盲降设备,恶劣天气无法飞行。福州空港交通问题直接影响对外开放交流,习近平来福州后于1991年初提出建设现代化大型机场构想,得到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福州市干部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但当时国家没有安排福州机场建设项目专项投资,建设资金不到位,

习近平创造性提出由地方筹资建设新机场的思路,形成立项报告。1992年6月中央批准同意,1993年元旦开始建设,长乐国际机场于1997年6月正式营运。长乐国际机场从构思、规划、组织设置、团队选拔、设计策划、资金筹措、建设等,均由习近平亲自作出决策,参照当时国际现代机场的规划设计,保证20年内不会落后。从原来只有军民两用小机场到拥有区域门户枢纽机场的蜕变,不仅极大促进福州的经济发展,也为海峡两岸的深度融合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四) 福建省实践 (1996-2002年)

1996年至2002年,习近平先后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抓住历史机遇,为福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

1. 以“数字福建”率先探索信息化创新发展。上世纪末,“数字化”“信息化”还属于科技前沿概念,习近平高瞻远瞩,以非凡战略家眼光谋划福建信息化发展,提出福建省要走数字化与智能化相结合的信息化建设之路。对全省信息化建设最为薄弱的农村地区,财政给予了重点支持,实施村村通电话工程。这些举措充分发挥出通讯基础对经济发展的倍增器作用,促进福建信息产业数字化纵深发展,这也是运用信息技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早期实践。

2. 以林权改革为突破口,解除生产力约束。产权制度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十分重视产权制度改革探索,以林权制度改革为试点,探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2]。在习近平的积极推动下,福建省率先在全国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着重从林业产权、经营权、处置权、受益权四个方面入手,2006年又率先推进完善综合配套改革,增强林农积极性,焕发传统林业新活力,林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福建重点林区基本做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实现“国家得绿,林农得利”目标^[3]。

3. 以“晋江经验”树立县域经济发展样本。1996年到2002年期间,先后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习近平七下晋江,下基层、进企业、访农村。

经过多次调研,2002年6月,习近平从晋江发展的实践中提炼出“晋江经验”,并于同年8月和10月,分别在《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上发表文章,总结了晋江经验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六个启示,提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晋江经验”^[4],强调要始终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妥善处理有形通道与无形通道之间的关系;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同时,要妥善处理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等理论主张。在“晋江经验”的启示下,县域经济成为福建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从全国林改第一县武平县,到水土治理的红色样本长汀县,福建省探索出多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

二、经济思想理论演进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福建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他在福建工作时期的经济理论探索,为我们学习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演进提供了一个丰富视角。

(一) 理念层面: 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扩展

习近平经济思想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刻揭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的经济思想理论逻辑蕴含着能够引领时代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人对经济增长的认识停留在物质层面,认为GDP是评价地区发展的唯一重要指标,较少关注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重新审视与思考部分地方政府单纯的唯经济增长发展观。1995年4月,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全面发展的内涵作出阐述,“发展不仅是速度的加快、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整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既体现出发展速度快与慢的辩证,也包含了质与量的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我们的地方。同时必须看到,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5]。从

福建实践到党中央,习近平科学梳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逻辑关系,强调“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排斥逻辑”。保护生产力的根本前提是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路径是改善生态环境。除此之外,新发展理念的内涵从经济生产方式的五个维度辩证阐明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即“创新发展”阐明了发展动力的来源,“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绿色发展”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力求消除贫富差距、各主体公平发展的问题。新发展理念科学回答了当代经济学中“如何生产、怎么发展”的问题,其理论演进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化演绎的过程。

(二) 目标层面: 以人民为中心经济思想的深化

习近平经济思想最核心的问题是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第一次记者见面会时向世人旗帜鲜明亮出了施政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直接表达共产党的价值取向或政治实践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富国富民、人民利益至上的核心追求。“为谁生产”“生产什么”,习近平始终把握住符合时代特征的人民真实需求以及在需求方面的变动趋势,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的层次和结构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业和温饱是最主要的民生需求。“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利益……使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和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得到相应提高,过上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生活。”^[6]这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对那个时代作出的最准确最有温度的呼应,朴实阐述折射出当时人民群众最真实的期盼。

随着物质财富积累,休闲娱乐、健身旅游、医美康养、优质居住环境等越来越被人们所期待,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立足增强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变化,创新发展模式、业态,实现发展的

关口顺利转换。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严重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7]，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思路。从学理性来看，国内大循环指经济社会再生产活动的整个过程，从投资到生产，再从分配到流通，最后到消费，这几个环节周而复始地循环，并且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跟以往“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需驱动型经济循环有根本区别，更加强调加大对内开放力度，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提升生产率，努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最终构建超大规模市场。这正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人民的需求是新发展格局的起点和基础。

（三）实践层面：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的再认识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长期困扰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里，部分学界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有保持高度的计划调控，各微观经济主体才能在大系统里有序合理运行，全面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机制；另外一部分观点则盲目信仰和鼓吹西方自由市场主义，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纯”市场改革化路径，全盘否定政府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等。习近平基于福建工作积累的经济管理实践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清醒认识到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的重要性，在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对以上观点专门撰文论证驳斥，指出这些研究探讨的视角都将社会关系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没有正视社会经济活动的普遍性规律和生产关系在经济运行中的反作用，忽略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循环和危机的内在联系，对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因素视而不见等^[8]。他提出必须充分发挥两个方面的优势，即“要使之能够像发展资本主义生产那样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将市场经济

与社会主义有机地融为一体”^[9]。至于二者如何有机融合？习近平2002年在总结“晋江经验”的“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论述中进行清晰阐释，他科学指出正确处理好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与发展市场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严格依法限定政府自身权利边界，积极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尽可能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加系统而全面深化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科学辩证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打破思想顾虑，一方面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强调政府要更加积极作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又一个重大突破，充分反映了习近平对市场与政府辩证关系的理论新高度，突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的狭隘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开拓性探索，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空间层面：对外开放的拓展

社会内部和外部交往是生产力发展存在的条件，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在闽工作期间，习近平对外开放的思考主要聚焦于扩大对外贸易与引进外资，提倡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技术水平，想方设法打通国际市场，多层次、多渠道利用外资。在资金短缺阶段，除了自身努力外，还要善于吸收别国资金、技术和管理，这是早日摆脱贫困和跨越发展的关键手段。

如何正确认识 and 把握当今世界大势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习近平用四句话进行了精辟阐述：“尽管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不容忽视，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但捍卫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平的势力，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但‘地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

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十七专题)^[10]。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仅深刻把握世界大势及中国对外开放新趋势,而且高瞻远瞩提出要以“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为新时代开放的目标,整合对外开放战略,在实践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开放合作,提升开放安全边界,在安全基础上集合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积极完善现行全球治理制度安排,改良和维护国际贸易规则,提升对外贸易质量。随着对外开放空间维度的丰富,相互协同追求“互利共赢”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体现国内人民各种利益的协调兼容,也涵盖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共享增长。习近平坚持秉承互利共赢原则推进世界各国各地区开放交往,2014年外交经济会议上,他提倡以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平等协商追求“互利共赢”,折射出更加包容共享的新时代开放观。

三、启示和理论意义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形势、新问题,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经济实践和理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行动指南,对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跨越三大关口、推动高质量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 一以贯之的群众观点

群众路线是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具体反映。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作出“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等论述,研究制定的经济政策目标直接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紧密联系,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上,这些均生动体现了习近平鲜明的人民立场。如“吃菜难”是上世纪90年代福州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之一,由于经常刮台风、发大水,蔬菜供给紧张,百姓最大的民生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直面民生痛点,通过一系列“菜篮子工程”建设,彻底解决福州市民“吃菜难”的问题。他利用闽江淤积冲击而成、土地平整肥沃的琅岐岛建设福州菜篮子基地,扩大市区蔬菜供应,积极培育壮大福州市蔬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生猪屠宰厂等基础商业配套设施,完善市场自发调

节功能,打通外地蔬菜入闽供销渠道,有效解决了福州蔬菜短缺问题。

(二) 尊重市场规律,坚持原则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充分展现出尊重市场规律、坚持原则的特点。上世纪末,在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推动下,沿海地区你追我赶,地方经济发展流行“红灯论”观点,认为“黄灯赶快抢,红灯也可以试着闯一闯”。对此习近平多次强调,福建不能搞这种“红灯论”,虽然都希望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加快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但违反中央原则的事情坚决不能做,一定要厘清政府的行为边界,弄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尊重市场,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三) 强烈的创新意识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展现出持之以恒的勇于创新精神,敢于打破主观偏见和传统思维束缚,不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见解,解决新问题,提出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思想观点和实践举措。他率先在厦门实行企业税利分流,在福州积极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他从晋江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极具前瞻性的“晋江经验”,科学总结了晋江经验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六个启示,创新性阐释了“五大关系”之间的辩证逻辑和正确处理方式。“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为解决今天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行动指南。当前经济下行叠加全球疫情严重影响,唯有改革创新,心无旁骛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中国经济才能化危为机,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四) 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论。上世纪80年末,习近平就开始运用此策略与方法。当时宁德发展落后,干部思想状况浮躁,急于求成,冒进心态普遍较重。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他冷静分析指出,“治乱绳,不可急”^[11],在情况不明、心中无数的时候急于做决策,容易违背科学,脱离实际,造成重大工作失误,主张提高高科技核心技术水平、科学精细化管理、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方式、着眼内涵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等。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超前的预见性和启发性。

四、结语

理论源于实践, 又进一步指导实践。我国经济改革发展进程波澜壮阔、实践宏大独特、成就举世瞩目, 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 勇立改革潮头, 紧紧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时代课题,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和敏锐判断力, 深刻总结了福建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 提出一系列经济发展新理念、新观点, 揭示经济科学发展规律, 丰富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重要的实践与理论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解决当代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科学理论指引,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行动指南。在新的历史阶段, 必须坚定不移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摆脱贫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 [2] 习近平. 福建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研究[J]. 管理世界, 2001, 10(5): 7-8.
- [3] 习近平. 扎扎实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J]. 求是, 1996, 5(10): 26-28.
- [4] 习近平. 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N]. 人民日报, 2002-08-20(01).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6] 习近平. 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J]. 求是, 2001, 10(19): 31.
- [7] 习近平.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EB/OL]. (2020-05-24) [2020-10-12]. <http://http://www.chinanew.com/gn/2020/5-24/913218.html>.
- [8] 习近平.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辩证关系[J]. 红旗文稿, 1998, 6(1): 2-4.
- [9] 习近平. 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兼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借鉴[J]. 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2001, 9(3): 4-6.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11] 习近平. 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J]. 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1989, 5(2): 33-34.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Evolution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during His Work in Fujian Province

YU Jianxiong

(Economics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Fujian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During his working period of seventeen and a half years in Fujian province, Xi Jinping always insisted 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economic work to ensure that the economy develop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dhered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took emancip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at that time, Xi Jinping dialectically mana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regarded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as a breakthrough, actively explored the local practice of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ut forward many forward-looking views and innovative measures, which forms the rudiment of his economic ideological framework.

Key words: Xi Jinping; economic thought; practice; theory; evolution

(责任编辑: 练秀明)